

广播影视工作谈

艾知生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大膽實踐 不斷總結
努力提高 廣播影視
水平

李鐵民

一九九七年三月

序

艾知生同志长期从事我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的领导工作，从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十分关心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他将自己这些年来关于广播电影电视工作的一些讲话、著述整理筛选，汇编成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此，我是十分赞同和支持的。知生同志邀我为本书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乃欣然命笔，以不负嘱托。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广播电视和电影，广大群众也十分关注。主管全国的广播电视和电影工作，不用说，责任是很重大的。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把工作做好，使上上下下各方面都满意，实在是不容易的。

到广播影视部来以前，知生同志对广播影视工作并不太熟悉，但他服从党的安排，挑起了这个管理的担子，从不熟悉到熟悉，而且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这9年，是全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社会影响日益深广的一个时期，同时电影事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全国广播电视事业和电影事业能够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除了有党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的大好社会环境，有亿万群众对广播电视和电影事业的支持，有全国广播电视和电影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不懈的努力等这些必不可少的因素外，毫无疑问，也有艾知生同志做出的贡献。知

生同志对自己肩负的重任是尽职尽责的，他以自己认真负责和扎实有效的工作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这本书中收录的，就是知生同志在这9年中发表的关于广播影视工作的各种讲话、谈话和文章。这些内容记录了知生同志本人及以他为首的部领导集体关于广播影视工作的管理思想，记录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and 体会。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知生同志在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抓大事不含糊，靠两头不动摇”，相信这一点将会给每一位阅读本书的同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所谓“抓大事不含糊”是指，及时地不折不扣地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高度负责地掌握宣传舆论导向，抓宣传节目质量的提高，抓广播影视队伍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抓对事业、队伍的严格管理等，在这些方面，知生同志是态度坚决，毫不含糊的。所谓“靠两头不动摇”则是指，做好广播影视工作，上要紧紧依靠党中央，依靠各级政府；下要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包括依靠系统内的广大干部职工和依靠社会各界的人民群众。在这紧紧依靠“两头”方面，知生同志同样是态度坚定，无论任何时候都毫不动摇的。知生同志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断为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朴素的道理。

知生同志的这本书，大致记录了这9年中全国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我们提供了对事业发展历史进程的认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这对我们绝大多数广播影视工作者特别是各级负责干部来说，肯定会有不少帮助。

这本书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们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徐家山

1997年3月12日

作者自序

(一)

到广播影视战线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突然的毫无准备的事。

1985年3月上旬到4月上旬，国务委员谷牧同志作为我国政府特使出席巴西当选总统就职典礼，并顺访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当时我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任副秘书长，奉命陪同谷牧同志出访。4月9日结束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4月10日）上班时接到当时的副总理兼秘书长田纪云同志的通知约我单独谈话。纪云同志向我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任命我为广播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决定，并且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我体会广播电视非常重要，中央调你去是要把好宣传关。”我当时深感责任重大，而且事前毫无所知。有些好心的同志知道这件事以后，也对我讲了这项工作的艰巨和复杂。然而，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对于工作调动，我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这次也没有例外。在这次谈话后，我就着手了解情况，为走上新岗位做准备。我首先向吴冷西老部长请教，还走访了一些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个月后，1985年5月7日，我首次来到广电部，参加了部党组会议。紧接着5月9日，在广电部处以上干部会议上同大家见面。本

书第一篇文章《紧紧依靠党和群众，共同做好广播电视工作》就是那次会上讲话的记录，也可以说是我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开场白”。这一“开场”以后，不知不觉干了整整9年。9年后，1994年5月，我由于年满65岁从部长岗位上退下。本书最后一篇《告别的话》（1994年5月21日）可以说是我担任部长的“结束语”。

9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要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作报告，有些还要整理以后在报刊上发表。我的习惯是自己动手起草文稿，这样每年累积起来就有几十篇文稿留下。在我退下后不久，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同志热情地向部领导提出建议，为保存资料，作为今后研究我国广播影视发展的参考，将我9年来有关广播影视工作的文稿，编辑成书。这个建议很快得到部党组的批准。对我个人来说，也就是要对担任部长9年的工作作一个回顾，从每年的文稿中挑选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汇编成册。

在编辑本书的时候，为了尽可能保持原貌，如实地反映各个时期的思想认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除了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外，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当然从现在以至今后的眼光来看，肯定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给予批评指正。

（二）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我在9年的工作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宣传工作上，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我提出的要求，也是符合广播影视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的。

1985年4月13日，也就是准备到部工作的前夕，乔石同志在中央组织部代表党中央约我谈话。乔石同志对我详细介绍了广播电视部的历史和现状，讲了决定调我的经过，然后着重讲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对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电视发

展很快，问题也很多，数量增加了，质量问题大，老把不住关，特别是文艺节目把不住。”当时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1985年的春节晚会没有搞好，引起全国观众的尖锐批评，中央各有关部门收到大量来信。我来到广电部时，部里已经开过7次党组扩大会，总结春节晚会的经验教训。同时作为整党以后改进工作、防止宣传工作发生重大失误的整改措施，建立了由部长和主管宣传的副部长轮流审看每天的《新闻联播》的制度。我到部以后立即投入了这项工作。9年来，除了有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以外，我几乎每天下午5点以后到中央电视台和部、台的同志们一起审看《新闻联播》，实际上是和同志们一起编排节目，及时发现纠正各种可能发生的包括文字上的常识性的差错。我到部不到两个月，7月4日傍晚，胡耀邦同志和广电部党组的同志一起审看专题片《人民必胜》。看完片子以后又和我们一起看完了当天的《新闻联播》，然后从7点半开始和部党组一起详细地讨论我部的工作，作了系统的具体的指示，又一次强调了审看节目特别是每天的《新闻联播》的重要性。他问我们：“你们看不看每天的《新闻联播》？”接着又说：“你们要像报纸的总编辑每天看大样那样审看《新闻联播》。不到半个月，你们那里出了两个乱子（指报错了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职务）。第二次出错我就发火了。这是名单，内容上的问题就更多了。你们对广播电视节目要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地改进。你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每天编排节目、审查节目、提高节目质量。”的确是这样。9年来的实践证明，我每天到电视台都是“不虚此行”。如果没有“三堂会审”（指部领导、台领导、新闻部领导一起审查），播出的错误要远比实际播出的为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次春节前夕审查联播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同志若有所思地提出一个问题：“刚才头条新闻第一句话似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把政治局委员报成了常委。”大家都没有这个印象，但都认为事关重大，于是重新放录像，果然证明

这位同志的印象是对的，于是重新录音，防止了一次重大事故。在最初的几年，这样的险情几乎是不断发生的。一位分管宣传的副部长说：“我们有坐在地雷阵上的感觉。”我这9年中，每天一起床就边洗漱边听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上了车接着听，发现了问题立即打电话纠正。

当然，审看新闻节目并不只是消极地挑错、“找碴儿”，堵漏洞，防止差错，更重要的是走上新闻宣传第一线和同志们一起在实践中深化新闻改革。许多新闻改革的新思想、新措施恰恰是在审看新闻，实际上是和大家一道编排节目的过程中，集思广益，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工作而产生的。例如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当天下午，我正在电视台新闻审看间。当看完编辑编排好的片子后，我和有关同志当即决定打破惯例，将这条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国际新闻作为当天《新闻联播》的头条播出，结果在全国观众和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得到肯定和好评。又如，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人大、政协两会电视实况转播，首先起始于1987年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是钱其琛等3位副总理答记者问，其中有许多外国记者参加。这次招待会在下午3点结束。电视台原先设想，把外语翻译一段一段地去掉后再编辑出来，于下午5点播出。当时我站在编辑机旁看到这种工作方式进度缓慢而时间又紧迫，于是我就和其他同志商量，干脆连翻译部分一块播出，这样又省力又有真实感，还可以免去层层审查。播出后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强烈效果，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报道形式。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也是一项新的改革，以后就都这样搞了。当然现在把外语翻成汉语配音播出比那时又大大前进了。

我举这些事例是要说明，电视新闻改革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是长期坚持把关并不断有所创新、向前发展的过程。我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如果说新闻是电视节目的“重中之重”，那么电视春节晚会则是电视文艺的“重中之重”。这是一台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晚会。每年除夕之夜，海内外亿万华人聚守在电视机前一同收看，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春节的一个新习俗，受到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一般是在每年的国庆前后开始筹备，有时甚至更早。从本书《关于电视春节晚会》一文就可看出，1986年春节晚会早在1985年8月就开始着手准备了。部领导年年都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晚会节目的审查把关。具体程序是先分类审看节目，如相声、小品、歌舞、戏曲等。这样一批接一批审看，然后邀请社会多方面人士参加，提出修改意见，再反复加工排练，最后在播出前各类节目集中在一起进行彩排，最后一周每两天彩排一次。为了办好春节晚会，电视台许许多多编播工作人员和有关领导忘我工作，日夜忙碌，一直要忙到初一凌晨两三点钟才能松一口气。我也和剧组的同志们一样，9年来没有一个除夕是在家中度过的。每当晚会结束，我从电视台回到家里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钟了。第二天8点再赶去参加春节团拜，了解各方面对春节晚会的反映。

对于广大观众十分关注，在电视节目播出量中占据相当比例的电视剧以及国产电影等文艺节目的“重头戏”，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和对重点影视片的审查。广电部每年年初都要召开一次电视剧题材规划会和电影创作会议。从1986年起，我每次都参加这两个会议并讲话。对许多重大题材影片审查、讨论都直接参与。有时对一部电影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常常看过不下七八遍。当然影片质量每次比前一次都有新的进展。

除了上述每天的新闻，每年的春节晚会，100多部电影和几千部集的电视剧以外，每年还有若干次集中的重大宣传任务。如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重大政治活动（党代会、中央全会），重大的节日以及重大的体育活动（亚运会、奥运会），这些重大任务大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一领导、直接指挥之下，部、台

领导组织专门班子，集中人力物力，全力以赴。也正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一般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收到较好的效果。许多重大的新闻宣传改革，例如奥运会的直播不仅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实际上是报道“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改革往往都是在完成重大任务中突破的。

9年工作中，除了广播电视宣传这项中心工作以外，其他工作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科技工作也有迅猛的发展。80年代初期我国全社会电视机拥有量大体在1000万台左右，10多年来每年以一两千万台的速度增长，到我离职时已超过了2亿台。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由57%提高到76.3%和82.1%（现在又提高了许多）。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进展，归根到底是采用先进技术的结果。仅以卫星传送广播电视节目为例，我到广电部以前，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同志就约我谈话，明确指示从租用外国卫星起步，大力发展卫星传送技术。当年从国务院赠送“老少边穷”地区50座地面接收站起步，到我离任时全国城乡已经拥有地面接收站几万座，远远超过了原来规划“七五”末达到5000座的目标，大大提高了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这生动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三）

9年的广播影视工作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这项工作，最主要的是三个“依靠”：

一、首先是要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中央宣传主管部门的直接指导，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团结、稳定、鼓劲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这些基本道理，现在大家都

很熟悉，但是要在工作中真正贯彻落实就不容易了。特别是在复杂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就更加困难了。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广播电视就曾经发生失控，偏离了党的正确路线（见本书《严峻的考验，深刻的教训》一文）。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帮助我们及时坚决地纠正了错误，重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我们的工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又及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91年7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纪念建党70周年晚会结束后，我刚回到家里还不到10点，就接到江泽民总书记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我都仔细看了，非常好，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的《新闻联播》编排得很好。……这台晚会很好，把历史上有名的革命歌曲浓缩到一起，非常生动感人，特别是老一代艺术家都出来了，又有新的歌手，这说明我们的文艺事业后继有人。”“晚会上老一辈革命家都出现了，包括健在的小平同志，而且还有与我党长期共同战斗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还有老中青科学家，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体现了我们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明编导考虑得很全面。”在这次电话里，江总书记还就电视的作用，电影工作以及加强民族宣传，加强对青少年近代史和国情教育，加强广告管理等问题讲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江泽民总书记不仅在党中央各次重要会议上对宣传思想工作作了许多系统的指示，而且还在各种场合当面或打电话对广播影视直接给予指导。类似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年都有。至于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更是随时随地具体指导，难以计其次数了。

二、要依靠广播影视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首先是要依靠部党组这个领导班子。回忆这9年，部党组成员几经调整，先后有10多位同志在一起共事。遵循毛主席《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的教导，作为班长，我注意原原本本地向党组传达党中央、国

务院以及中央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所有重大问题提交党组讨论，讨论中尽可能使同志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至今感到欣慰的是，在这9年中部党组可以说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党组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渡过了一些难关，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应当肯定每位党组成员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使我至今仍感到温暖。利用这个机会，向曾经在党组里共过事的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依靠广大的观众、听众。广播影视归根结底是为广大观众听众服务的。我们服务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观众听众是否满意，是否赞成。广播影视应当怎么办？群众需要什么节目？怎样满足群众的需要？什么节目好，什么节目不好，归根结底，要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群众不欢迎的东西，无论怎样造舆论、“炒热”，群众也是不会买帐的。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树立坚定的群众观点，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9年中，我每天都要批阅几封直接写给我的观众听众来信。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我的不少观点、意见、办法都是倾听群众意见的结果。例如《关于电影党史的一点想法》就是听了许多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于电影的反映以后产生的。除了群众来信以外，许多报刊有关广播影视的评论，我尽可能地多看，其中也反映了观众、听众的呼声。由于中央三台和电影的审片任务较重，我外出调查不算多，但一有机会我就要深入基层，一竿子到底，直接访问听众观众。本书中提及到湘鄂西、贵州、延安等地的考察，特别是《从国情出发，办好山区广播电视》一文完全是走访了大量城乡，主要是农村观众听众以后写成的。

眼下，这本关于广播影视工作谈的小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回顾过去9年的工作，究竟有什么得与失，有多少成与败？我也相信“人民群众是最权威的裁判员”。我期待着能听到真实、客观的评说。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文稿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王锋同志和我的秘书唐世鼎同志承担完成的。广电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领导为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1997年3月15日



作 者 简 介

艾知生，男，汉族，1928年12月生，湖北汉阳人，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至1950年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曾任中共地下组织支部书记、共青团总支部副书记。1950年至1951年任中共清华大学总支部副书记。1951年至1966年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1951年至1960年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1966年至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劳动。1971年至1973年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至1976年再次受到冲击，下放劳动。1976年至1978年任清华大学水利系三门峡基地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至1979年先后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领导小组委员会副书记、书记。1979年至1983年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副校长。1983年至1985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1985年至1986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共广播电视部党组书记。1986年至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中共广播电影电视部党组书记。1994年4月任中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曾担任过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6月7日，在河北怀来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现场了解影片拍摄情况。



1988年1月26日，在黑龙江电视台考察。



1988年4月29日，在湖南怀化大中坡发射台考察。

1989年3月3
日，在江西宜丰新
庄广播站调查研
究时与职工亲切交
谈。



1989年3月4
日，在江西电视台
调查研究。



1990年11月6
日，在电影《开天
辟地》拍摄现场考
察时与演职人员合
影。





1991年11月21
日，在安徽颖上宋
井营广播站考察。



1994年3月27
日，在浙江宁波电
视台调查研究。



1992年6月20
日，在贵州娄山关
发射台考察。